

历史哲学教程

翦伯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历史哲学教程

翦伯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历史哲学教程

翦伯赞 著

责任编辑：何瑞田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45千字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3,000册

ISBN7-301-01308-6/K·94

定价：3.80元

GP18-7/10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于1938年撰写的一部史学名著，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本书内容不是一般地讲述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原则分章，结合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实际，对我国发生在1928—1937年间的“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当时参加论战的各方，其中包括中国及苏联、日本、欧美的史学家的主要理论、观点和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评述或批判。本书为继往开来的著作，不仅总结了过往，对此后乃至今天的史学研究都有重大的影响。本书曾四次出版发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为进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视为必读的教科书。这次整理出版，是第五次印行，对当今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翦伯赞同志

序

我原来是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史方面范围较大的著作。我想在消极方面，对于从来各家的中国史意见，作一较详尽的清算；在积极方面，较系统地提出我自己的意见。但当我这一工作计划正在进行的当中，由于神圣的民族抗战的展开，便不能不略加改变。原来所搜集的一些材料，亦随同京沪沦陷而失散，这在我个人，是一件值得痛惜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因此，我在今年二月，便开始改写这本历史哲学教程。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

近十余年来，出现在中国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实验主义，他们在史料的考证上，确实有着相当的贡献；但在其对具体历史的研

究上，却反而把中国史玄学化，在某些意义上，甚至给了许多相反的影响。历史的形式主义者，隐藏在史的唯物论的外衣里面，传播“半波格达诺夫主义”“半实验主义”的毒素，迷惑于历史的零碎现象，拒绝对历史之本质的说明。经济唯物论，即机械论者，也同样隐藏在史的唯物论的术语之下，无耻地从事于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企图假借科学社会主义，发挥其政治上之反动的阴谋，在理论上，使历史复归于进化论。另一方面，在某些史的唯物论的历史家的名著中，他们虽然尽过了主观上的努力，但对于历史理论之本质的理解，也依旧不免犯了或多或少的错误。

正在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情势下，歪曲与错误的理论，反能获得其流行的可能。在大学的讲座上，在各种流行的刊物上，到处散布其欺骗青年的毒素。他们任意歪曲、蒙蔽或涂改具体的历史事实，以求适合于其阶级的要求与幻想。象这样各种各样的历史理论，不仅对于历史科学的本身是一个污蔑，即对于一般青年对中国历史之正确认识，尤其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前途的认识，更是一个毒害。因此，对于这些错误的历史理论之彻底澄清，不仅是历史科学的研究任务，而且是目前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紧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假如把那各种各样的历史理论，一一加以批判，那会把我引导到极其广泛的领域中去，而事实上，大半又是反复陈说，千篇一律，没有一一批判的必要。因此，我在本书中，仅就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曾经或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多少发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几种理论体系，作为批判的对象。

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

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哲学虽然在近年来所展开的社会史论战中附带地提到，但不幸大多只注意到文句的抄袭，而忽视那具体的历史事实，因而便不免是引经据典，以抽象的定义去歪曲真正的具体历史，反而把史学玄学化。结果，历史哲学在中国，或者沉溺于刻版的公式主义，或者使理论脱离实践，陷于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关于历史哲学之系统的著作，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看见。因而我想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历史研究者一读的。此外盛岳译的《史学新动向》尤其是值得特别介绍的。由于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即分期史，也还相当的贫乏；至于世界史，更没有提到研究的课程上。

关于中国通史，除日本历史家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苏联历史家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等似是而非的著作外，我们还没有看见一部相对正确的中国通史。

在原始社会史方面，在中国史学界，较有系统的著作，除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及专门从事史料考证而与原始社会史料有关的，如顾颉刚的《古史辨》，郭沫若的关于金石甲骨文字的著作，以及李济、董作宾等人关于安阳等地的发掘报告书等等外，就只有一些零碎的论文。而这一原始时代的历史，对于说明后来一切继起时代的历史之重要，又是无疑的。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史以至初期封建社会史，除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殷周时代中国社会》、柯金的《中国古代社会》外，虽然还有几部堆砌式的著作，但都是没有其自己的系统。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除一些史论的著作外，在中国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一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二、三、四册、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杨东蓀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讲话》以及谭丕模的《宋元明学术思想史纲》、《清代学术思想史纲》等。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之部门的即政治形态或意识形态的叙述，对于中国历史这一长时间的演变之全面的叙述的著作，也还没有出现。然而这一封建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又有其极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近百年殖民地化这一过程的历史，除去施存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以至作为部门之研究的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外，也没有系统的著作。然而这一时代的历史，对于目前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尤有其直接的影响与作用。

此外，关于国内各民族，如回纥、西藏、蒙古、女真、苗族、瑶族……等的社会史，以及与中国历史有关的各民族，如琉球、朝鲜、安南、印度，以及南洋各地，中亚细亚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日本史，更是无人着手研究。自然，为了史料的缺乏，历史家也不能凭空杜撰；同时对于各民族的民俗学的研究，也不是风雨飘摇中的我国历史家所能如愿进行的。但在事实上，不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历史之相互影响的作用，要想写成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又是不可能的。

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内，还存在着许多荒原区域，需要继起的历史家，从事于历史科学之拓荒运动。因此，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观上，已经尽可能地去求其正确。至于客观上，本书的正确性能达到如何程度，这只有等待着大家的批判和指教。

著 者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于长沙

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

一

本书在一年内再版，对于我倒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在再版时，本书除了在文句方面略有修改，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一年前的见解，还没有觉得有修改的必要。并且本书是带有论战的性质，在我批判的对方没有改变之前，我当然不应作任何改变。

我在这里唯一想补充的一点，便是“群众及其领导者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三编论《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一节中，已经说到，不过，为了彻底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以为还有补充的必要。

现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著述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正象我们在旧的历史著述中看不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痕迹一样。忽略历史客观发展的规律，是史的观念论者的一贯作风；忽略历史主观创造的作用，也不是辩证唯物论者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论者与观念论者及机械论者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同时注意历史之主观创造作用与其客观发展的规律，并且尤其注意它们在历史运动中之辩证的统一。

现在，在世界各地，在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到处都展开了战争与革命。殖民地奴隶与无产阶级的鲜血，刷红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中国与西班牙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大旗下，几百万人的英勇牺牲，几千万人的战斗动员，几万万人的走向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战场。这种壮烈而伟大的历史行动，标示了人类历史走向新阶段的象征。这一方面，固然是世界史自身发展的规律已

经达到了一个突变的时代；然而同时，也说明了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之伟大，说明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

一直到今天，中国还有不少的人忽视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还有人阻碍着群众运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之发展，这证明了理论上的错误，必然要发展为实践的行动。为了这种原因，我以为在这里特别的补充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

二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者认为旧的唯物论的理论最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没有把握群众行动的规律及其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史的唯物论者他不仅承认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并且从其生活诸条件上研究领导群众行动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的著作之一中，曾经这样说过：“历史的行动愈彻底，则推动这一历史行动的群众的力量愈广泛。”^①在这里，马恩所谓彻底的历史行动，当然是指的历史上的革命行动。因而在这句话中就包含着一个反面的意义，即任何带有反动性的历史行动，是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的。

只有当着基督教的运动还是反奴隶制革命运动的时候，他才能在古代世界唤起一个具有广大信徒的宗教运动。只有当着法国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时候，他才能唤起一个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法国大革命。只有当着美国为了争取民主主义前途的时候，他才能在新大陆唤起一个光荣的独立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只有在反奴隶制的号召下，才能使周武王唤起一个“亿万人一心”的朝歌之战。只有在反秦代地主阶级专政的号召下，才能使广大的农民在陈涉、吴广的领导之下，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揭竿而起。只有在种族革命的号召之下，洪秀全、杨秀清才能唤起一个几乎推翻清政权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只有在反帝的号召之下，才能在中国北部唤起一个“义和团”运动。只有在更进步的三民主义的号召之下，才能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全国各阶级各种族的人民的热忱拥护之下推翻清政权，建立中华民国。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号召之下，才能唤起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铲除北洋封建军阀，建立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权。

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充分说明了马、恩理论的正确。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在近代史上，许多新的历史事实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证明。

在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彻底的历史行动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它从其社会经济最深刻的根基上，废除了剥削阶级与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没有历史先例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象这样的历史行动的彻底性，是一切过去人类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因而也就没有一个过去的历史行动，能够象苏联“十月革命”一样，广泛而深刻地唤起了亿万五千万人狂热的斗争，唤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同情。

其次，便是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民族抗战。这一个历史行动的彻底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民族解放战争。就因为这一历史行动的空前彻底性，所以唤起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类，直接参加到这个斗争，唤起了全世界和平的人类——尤其是国际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奴隶——的伟大的声援与为着这一斗争的胜利而呐喊。这一个伟大而彻底的历史行动，他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民族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许多封建余孽及机会主义者都被骇倒而转化为汉奸，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因为失掉一切而疾速地转化

为无产阶级，广大无比的劳动者和农民大众都被迫而离开职业，离开土地，转化为坚强无敌的抗日游击军。铁道、公路被破坏了，河道交通被阻隔了，海口被封锁了，大部分的城市变成焦土，无数的农村变成沙漠，一切的文化遗存与文化机关，都变成灰烬了。在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中一切作为封建传统联系的：如家长制的主从关系，宗法社会的家族关系，都被切断了，被扫除了。在广泛而持久的革命战争中，一切作为半殖民地属性的：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品流通网，势力分配圈，都被打破了，毁灭了。总之，这一个战争，它彻底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原来的物质基础、阶级关系乃至建筑于其上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

就由于这样一个空前彻底大变革，在国际方面，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之更加狭隘，引起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相互矛盾之更加尖锐，引起了国际劳动阶级与殖民地奴隶之反法西斯侵略的高潮，创造了世界史突变的前提条件。在国内，引起了民族资本向西南与西北之大量的移注，引起了小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内地之蓬勃的兴起，引起了西南、西北经济建设与文化教育之普遍的发展，引起了内地城市之一般的繁荣，引起了流动人口与荒废土地之有利的结合。在这样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又引起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始，引起了中国文化思想上之战斗的与革命的高潮。总之，这一彻底的历史行动，毁灭了中国旧有的一切；同时，也创造了新中国的一切前提条件。

苏联的伟大的“十月革命”与中国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们之所以同为最彻底的历史行动，就因为它们是执行人类解放——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所以也才会同样地获得广大群众——整个阶级与整个民族——的热情参加与拥护。苏联的历史，已经证实了只有最被压迫的阶级，才能彻底地执行阶级斗争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历史，又在证实只有最被压迫的民族，才能最彻底地执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同时，世界史

的原理，又将证实着只有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上，统一起来，才能完成整个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

这样看来，只有彻底的历史行动，才能唤起群众的力量，只有群众的力量兴起，才能执行任何一个历史的行动。反之，没有群众的力量，任何历史的行动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

三

从相反的方面看来，也是一样。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反动的行动，首先在其行动的本质，必然是反群众利益的。因而它必然与群众对立。但历史上存在着的许许多多的反动，为什么又有群众参加而使其得以实现呢？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其描写德国农民战争时，他引证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了在整个中世纪的欧罗巴所进行的反动历史事件，都是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之下执行的。他指出了十六世纪的德国的贵族与城市中等阶级为了反对压迫他们的封建诸侯，怎样地发动了一连串战争，怎样地把每一次这样的战争，都很巧妙地隐蔽在宗教的旗帜之下，怎样地以宗教的迷信唤起当时德国农民大众的同情，又怎样地在每一次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与其敌人妥协转而出卖其同盟者——德国的农民大众。

象这样的历史，不仅表现在十六世纪的德国，表现在中世纪的欧罗巴，同样也表现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尤其在中国。在历史之封建社会这一阶段，任何国家的农民，总是经常被地主阶级利用为争夺政权的工具，他们一千次被利用，同时也一千次被出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不知经过了多少地主阶级彼此间争夺政权的战争，无数王朝的更替，事实上，也就是剥削集团的换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甲剥削集团让

位于乙剥削集团。然而每一个新的王朝的创立，都是农民大众的力量，农民大众为什么把一个戴着皇冠的地主拖下王座，而另外把一个草野的地主送上王座呢？把一个旧的剥削者换一个新的吸血鬼呢？这就是因为封建意识限制了农民不能认识这些“英雄们”的本质，即他们同是地主阶级，同是以剥削农民为生的强盗，而以为他们是一个不剥削农民的“真命天子”。因此，即使他们被出卖了一千次，他们还是希望在一千零一次不被出卖。同时，在另一方面，每当封建地主主要利用农民大众的力量，来建立其统治并剥削农民的政权时，他首先就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变成一个“人间的神”，用宗教的外衣，隐藏他自己，并以此蒙蔽农民的眼睛，用神秘的号召，唤起农民的盲动，他就把这种盲动的力量，引导到他自己的目的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创业的帝王，不是“赤帝之子”，便是“白帝之子”；不是“以金德王”，便是“以木德王”。这就是为什么反动的历史行动，也一样能获得群众的参加而得以实现出来的缘故。总而言之，欺骗、麻醉与利用群众的愚昧无知，是过去一切反动历史行动之可能实现出来的基础方法。

其次，每一个历史上的反动行动单独地或孤立地看来，是反动的；但若把他统一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行程上去看，他或多或少总是具有一些进步性的。因为由于这个反动，他本身就是历史之辩证法的发展。譬如德国的农民战争，在其每一次出卖农民大众的方面看来，是反动的；但在其反封建诸侯的方面看来，又是进步的。同样在中国，每一次王朝更替的战争，在其同样都是争取剥削农民的政权上看来，是反动的；但在其每一次都是封建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上看来，则又是进步的。比如法西斯侵略主义，在其屠杀无产阶级及殖民地奴隶上看来，它是达到人类历史最反动的顶点；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行程上看来，它又是把这个制度，推到它的历史终结点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

因为历史的发展是矛盾的发展，就因为每一反动，都是促进正动的一个杠杆，就因为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行程上，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进步的意义，所以它才能产生出来。

再其次，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反动，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其反动性的；反之，它常常隐蔽在一种革命的姿态上；只有当着它接近于成功或完全成功的时候，才会暴露其反动性。例如在中国史上，当着周武王誓师伐纣的时候，他还隐藏在“弔民伐罪”的口号之下。只有当他毁灭了殷代的奴隶主的政权，把殷民整族整族地当作田土附庸，而分赐他的臣属建立周代的封建政权以后，才暴露出他的反动性。只有当着秦始皇并吞六国，形成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以后，他才执行“焚书坑儒”的反动政策。只有在汉高祖入关以后，他才发表与地主阶级妥协的“约法三章”。只有当李世民奠定了唐朝政权以后，他才开始以租庸调全部的负担，加在他的同盟者——小土地所有者与农民——的身上。在西方的历史上也是一样，当墨索里尼还是《意大利社会主义新闻》的主笔的时候，他还是伪装为一个最热心的工团主义者和劳动运动的指导者的姿态，去建立其在群众中的信仰。只有在他以有名的“罗马进军”被群众拥上意大利的首相地位以后，他才公开地用黑衫党员来屠杀群众。当希特勒在德国的法西斯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还是在其“四年计划”中装出对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关心的态度，只有当他的钢盔队组成以后，他才公开地把劳动阶级当作他的“敌人”。象这一些的事实，在东方与在西方的历史上，都如出一辙。这些历史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一种反动的历史运动之发展的形式，不管他到后来发展到如何程度，在其开始时，还是装出革命的姿态，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反动。假如汪精卫在喊着“革命者向左转”的口号的时代而死了，谁能知道他怀藏着汉奸的阴谋。因此，我们如果要暴露一种反动运动，或一种反动运动之被暴露，不是一开始就可能的，只有当着这种运